

# 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演变

刘滇楨, 唐波, 李春晖

(广州新华学院资源与城乡规划学院, 广州 510520)

**摘要:**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推动了韧性城市的建设,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居民生活发展5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总体上,2013—2022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发展不平衡;时间上,2013—2022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逐年上涨,年平均得分从0.354增至0.498,发展水平同比增长率波动较大;空间上,2013年、2018年、2022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变化较小,区域差异较大,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地区减缓的空间格局。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时空演变; 珠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3-0145-05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注重区域协调,保护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城镇化<sup>[1]</sup>。新型城镇化吸取了传统城镇化的优点并弥补了其缺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发展,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从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sup>[2]</sup>。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也不断丰富和完善,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评价体系、时空格局、影响机制和发展对策等方面。宋连胜和金月华<sup>[3]</sup>认为新型城镇化是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公共服务、居住区域、社会治理以及人居环境的优美化。陈明星等<sup>[4]</sup>认为新型城镇化体现在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引领下,打造以人民需求为根本、城乡协调共进、高效集约利用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sup>[5]</sup>。总的来说,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提升生活质量,着力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和分析,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也十分丰富<sup>[6]</sup>。曾建丽等<sup>[7]</sup>从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公共卫生、资源环境、创新发展、城乡统筹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上述学者都是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还有部分学者采用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进行测算<sup>[8]</sup>。另外学者们还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sup>[9]</sup>,如梁树广等<sup>[10]</sup>运用探索性数据分析和三角模型,分析中国县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珠三角地区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衍生出的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体系,由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生产要素实现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伴随着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发展为国内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之一。但珠三角存在建设发展模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压力大等矛盾和问题。因此,本文研究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和空间格局,为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珠三角协同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1 研究方法

依据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综合性、客观性、可行性的原则,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内涵<sup>[11]</sup>、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等相关研究成果<sup>[12-14]</sup>,并且考虑

**收稿日期:** 2024-08-12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4XGL035);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24KTSCX126);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2413902073)

**作者简介:** 刘滇楨(2002—),女,广东兴宁人,研究方向为城乡融合发展;通信作者唐波(1988—),男,湖南衡阳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经济等;李春晖(2004—),女,广东清远人,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珠三角地区实际发展的情况<sup>[15]</sup>,构建适合珠三角的指标体系(表 1)。

人口发展是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强调发展的重心应转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将发展的焦点聚焦在人的身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因此,选取了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和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进行分析。

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得以实现的基石,直接反映和影响城镇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的进步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水平和更优的社会生活品质,从而改善人们生活质量,这为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持续的动力。因此用人均 GDP,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和人均公共财政收入来体现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反映的是社会民生问题。坚持共建共享相结合,保障人民医疗、教育和保险等权益。因此用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每万人拥有医师数、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数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体现社会发展。

生态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前提,生态为城镇发展提供环境支撑,需要全面提升城镇品质。人民现对城市环境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用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体现生态发展。

居民生活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点,要做到以人自身为根本,需要专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就是所得能自由分配,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保障发展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福祉。选取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分析。

表 1 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珠三角地区 新型城镇化 发展水平	人口发展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	0.037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	0.058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0.097
		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034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0.144
	社会发展	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	0.097
		每万人拥有医师数	0.045
		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数	0.080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0.242
	生态发展	城市污水处理率	0.01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10
	居民生活 发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72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069

选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熵理论的多指标权重计算方法,适用于多指标决策问题<sup>[9]</sup>。具体计算步骤和公式参考文献<sup>[9]</sup>。

##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单元,以 2013—2022 年为研究区间,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各城市地方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来获取数据。未直接给出数据的指标,通过间接计算获得。

## 2 结果分析

### 2.1 时间分析

表 2 显示,珠三角地区 2013—2022 年 10 年间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一种持续且稳定的上升态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时间演变规律,且空间分异明显,各地级市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研究期内珠三角地区平均得分范围为 0.354~0.498,综合评价得分增加了 0.144,年均增长率为 3.87%。从各地级市来看,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其中,广州、深圳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肇庆发展水平最低。同时,各地级市增幅有所差异,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肇庆,高达 7.12%,说明肇庆近年来不断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年均增长率最低的是惠州,仅达 2.89%,说明惠州后期需要更加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

珠三角人口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3—2022 年,年平均值从 0.678 升至 0.767,综合得分增加了 0.089,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37%。从各地级市来看,研究期内人口发展水平年平均值最高的城市一直是深圳市,综合得分都在 0.990 以上,10 年年平均值为 0.997,而人口发展水平年平均值综合得分最低的城市一直是肇庆市,10 年年平均值只有 0.126,深圳市年平均值得分比肇庆市年平均值得分高出将近 8 倍,发展差异较大。深圳市经济实力强,当地生活质量较好,吸引外来人口流入。深圳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强劲,制造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大力发展金融、文化创意和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劳动者更多地加入二、三产业,促进人口发展。肇庆市经济辐射力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吸引力相对较弱,导致人口更倾向于流向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从而影响了城镇人口的增长。肇庆市产业结构仍在优化和升级,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够充分,影响了就业人员的比例。

表 2 2013—2022 年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年份	广州	佛山	肇庆	深圳	东莞	惠州	珠海	中山	江门	年平均值
2013	0.553	0.363	0.141	0.520	0.352	0.284	0.425	0.327	0.222	0.354
2014	0.628	0.363	0.129	0.560	0.357	0.279	0.444	0.336	0.206	0.367
2015	0.659	0.420	0.133	0.452	0.395	0.303	0.480	0.356	0.206	0.378
2016	0.656	0.411	0.155	0.631	0.370	0.284	0.462	0.326	0.218	0.390
2017	0.685	0.437	0.160	0.666	0.399	0.290	0.486	0.362	0.250	0.415
2018	0.628	0.441	0.166	0.693	0.407	0.300	0.500	0.360	0.256	0.417
2019	0.657	0.446	0.179	0.733	0.434	0.313	0.517	0.368	0.273	0.436
2020	0.666	0.453	0.206	0.726	0.437	0.328	0.513	0.359	0.296	0.443
2021	0.712	0.505	0.244	0.788	0.478	0.366	0.568	0.390	0.323	0.486
2022	0.737	0.530	0.261	0.791	0.494	0.367	0.584	0.426	0.292	0.498

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涨,2013—2022年,年平均值从0.080升至0.121,综合得分增加了0.041,年均增长率达到4.68%。从各地级市来看,研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年平均值最高的城市一直是深圳市,10年年平均值为0.229,而经济发展水平年平均值综合得分最低的城市一直是肇庆市,10年年平均值仅0.019,两者差值将近12倍。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享有政策优势,同时吸引了优质资源,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深圳注重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力。肇庆市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扩张和发展,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制约。

珠三角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涨,2013—2022年,年平均值从0.149升至0.181,综合得分增加了0.032,年均增长率达到2.21%。从各地级市来看,研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一直是广州市,10年年平均值为0.327,而经济发展水平10年年平均值综合得分最低的城市是肇庆市,10年年平均值仅0.106,两者差值3倍有余。10年内,江门和中山的综合得分皆跌至过最后一名。

珠三角生态发展水平整体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2年,年平均值从0.016升至0.021,综合得分增加了0.006,年均增长率达到3.57%。从各地级市来看,研究期内生态发展水平年平均值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市、惠州市和珠海市,10年年平均值均为0.020,而生态发展水平年平均值最低的城市是东莞市,10年年平均值为0.018,与生态水平年平均值最高的城市相差0.003。深圳市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促进了环境质量提升。深圳“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成效明显,深入开展垃圾分类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完成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覆盖率等指标,促进生态发展。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珠三角大力响应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可持续发展。无论在相关城市规划、政策方面以及教育宣传上,珠三角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大防污力度,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処理设施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同时加强环境教育与宣传,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珠三角居民生活发展水平整体呈上涨趋势,2013—2022年,年平均值从0.042升至0.099,综合得分增加了0.057,年均增长率达到9.90%。从各地级市来看,研究期内居民生活发展水平年平均值最高的城市是广州市,10年年平均值为0.103,而居民生活发展水平年平均值最低的城市是肇庆市,10年年平均值仅0.020,两者相差0.083。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具有优越的资源条件,经济发达,产业集中,带来较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增加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扩大消费水平,也满足居民需求。各级政府都注重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实施惠民政策,使得居民的经济实力和购买力提高。调整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 2.2 空间格局

根据2013—2022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选取2013年、2018年和2022年3个时间节点从空间维度来分析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采用ArcGIS软件中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对2013年、2018年以及2022年珠三角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进行了系统的分级处理。根据不同得分范围,分出低水平区、较低水平区、较高水平区以及高水平区,直观地反映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差异和变化。具体空间格局演变如图1所示。

2013年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的城市有广州、深圳,较高水平区的城市有珠海、佛山、东莞,较低水平区的城市有中山、惠州,低水平区的城市有江门、肇庆。2013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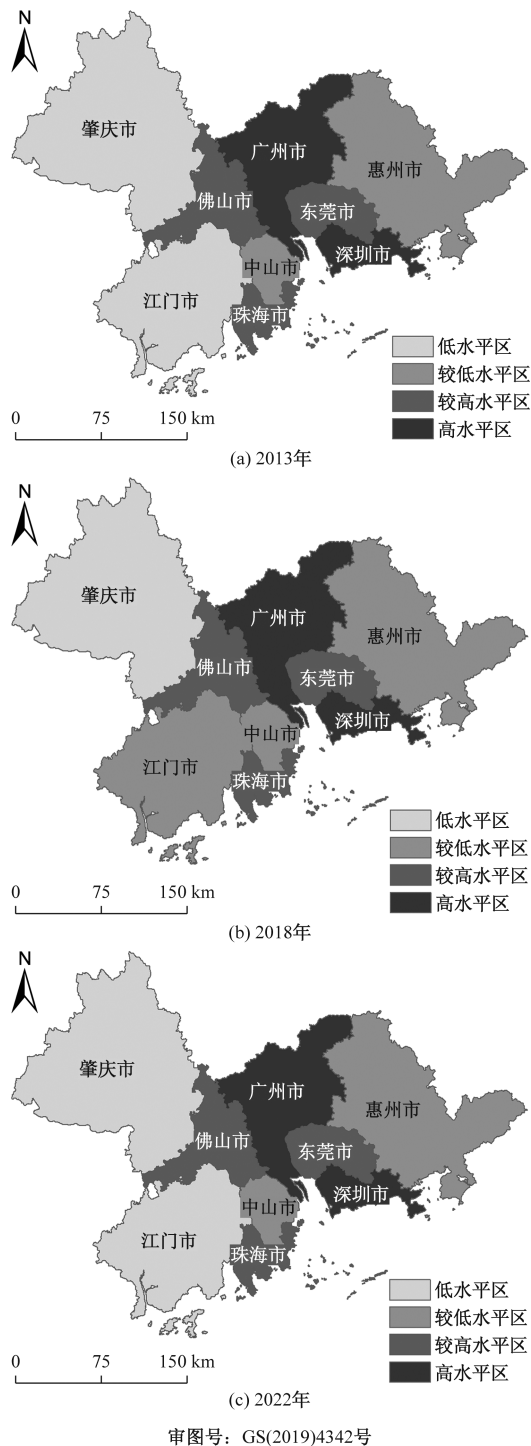


图 1 2013 年、2018 年、2022 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图

0.141~0.553,年平均值为 0.354。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是广州,综合得分为 0.553,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城市是肇庆,综合得分为 0.141,广州的综合得分接近肇庆的 4 倍。

2018 年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的城市有广州、深圳,较高水平区的城市有珠海、佛山、东莞,较低水平区的城市有中山、惠州、江门,低水平区的城市有

肇庆。2018 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在 0.166~0.693,年平均值为 0.417。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是深圳,综合得分为 0.693,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城市是肇庆,综合得分为 0.166,深圳的综合得分是肇庆的 4 倍。

2022 年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的城市有广州、深圳,较高水平区的城市有珠海、佛山、东莞,较低水平区的城市有中山、惠州,低水平区的城市有江门、肇庆。2022 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在 0.261~0.791,平均值为 0.498,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是深圳,综合得分为 0.791,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城市是肇庆,综合得分为 0.261,深圳的综合得分是肇庆的 3 倍。

从整体来看,2013 年、2018 年、2022 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变化不大,总体在缓步上升。其中,江门 2018 年从低水平区升至较低水平区,但在 2022 年又从较低水平区降为低水平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地区减缓的空间格局。在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的综合得分一直是发展最低城市的 3~4 倍,区域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需要改进的空间较大。中部地区聚集广东省内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广东省省会城市广州也位于中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拥有政策和资源倾斜的优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经济发展水平高,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提供资金支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加快了发展进程。东部城市不断响应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在该进程中呈现出城市品质发展不充分、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西部城市经济缺乏新动能,城市吸引力不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础设施配置不完善等问题仍然突出,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

### 3 结论和建议

#### 3.1 结论

(1)2013—2022 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各指标层面发展水平呈现出稳步上涨的良好趋势,但各地级市差异明显,发展不平衡。

(2)从时间维度上看,2013—2022 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逐年上涨,年平均得分从 0.354 增至 0.498,综合增长了 0.144,年均增长率为 3.87%,发展水平同比增长率波动较大。

(3)从空间维度上看,2013 年、2018 年、2022 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变化较小,总体在

缓步上升。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地区递减的空间格局。

### 3.2 建议

(1)坚持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区等多驱动发展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城市间存在一定差距。后期需要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资源-科技-资本-人才等要素流转效率,探索产业园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机制,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的关联畅通。同时通过深化内部整合,充分发挥广州-深圳核心城市的作用,并强化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间的互补与合作。

(2)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珠三角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各城市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特色确定主导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积极发挥城市在产业引领的优势,推动农村资源深度开发和产业链延长。注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最后要完善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配套发展,提升服务品质与效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3)全面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围绕“强镇兴村”和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缩小珠三角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最后,从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权重来看,生态权重值最低,因此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需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保障城镇化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使城乡更加宜居。

### 参考文献

[1] 张继久.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再认识[J]. 社会科学

动态, 2018(2): 89-93.

- [2] 张筱娟, 徐维祥, 刘程军. 粤港澳“经济-土地-人口-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分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10): 54-64.
- [3] 宋连胜, 金月华. 论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4): 47-51.
- [4] 陈明星, 叶超, 陆大道, 等.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J]. 地理学报, 2019, 74(4): 633-647.
- [5] 单卓然, 黄亚平.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2): 16-22.
- [6] 任杲, 宋迎昌, 张泉. 中国新型城镇化内涵特征、水平测度与推进路径[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5): 102-110.
- [7] 曾建丽, 赵玉帛, 李淑琪.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J]. 生态经济, 2021, 37(10): 100-107.
- [8] 谢寿琼, 刘凯迪.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21): 75-79.
- [9] 欧进锋, 许抄军, 陈东.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3): 78-87.
- [10] 梁树广, 张芑芑, 臧文嘉. 中国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与驱动因子分析[J]. 开发研究 2024(1): 123-132.
- [11] 姚士谋, 张平宇, 余成, 等.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 地理科学, 2014, 34(6): 641-647.
- [12] 徐亚茹, 曾文, 李英. 新型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与驱动因素分析[J]. 地理信息世界, 2018, 25(1): 88-94.
- [13] 张春梅, 张小林, 吴启焰, 等. 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性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1): 16-22.
- [14] 宋香荣, 樊艳华, 单蕾娜. 新疆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生态经济, 2021, 37(7): 78-87.
- [15] 李金龙, 谢玲玲. 珠三角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初析[J]. 经济地理, 2011, 31(2): 242-246.

## Development Leve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New Urbanis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LIU Zhenzhen, TANG Bo, LI Chunhui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isation strateg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iti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life,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evel of new urbanisation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s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ere analyzed as an example. The time and spac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ts new urbanisation development level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s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hows an upward trend from 2013 to 2022, but the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among cities. In tim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new urbanis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ose year by year from 2013 to 2022, with the average annual score increasing from 0.354 to 0.498,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fluctuating greatly. Spatially, the spatial changes in the level of new urbanis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2013, 2018 and 2022 are small, with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slowing down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Keywords:** new urbanisation;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Pearl River Delta